

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

王 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

王 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新文学史稿

(下册)

王 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 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树山订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875 字数 596,000

1982年11月修订重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册

书号：10078·3285 定价：(上下二册) 2.25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

——重版代序

一 “鲁迅的方向”的普遍性意义

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为“新文学”。这个“新”字的意义是与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思想到形式”都与过去的文学有了不同的风貌。这是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尽管古典文学中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品中还有相当多的反帝反封建的因素；但从文学的时代特点和总的风貌来看，只有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才可以说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呼吸、共脉搏的，才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是由反帝开始的，到这个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以后，就又成了汹涌澎湃的反封建运动；当时的群众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①，就有力地表现了这

^① 《北京学生致各界书》。

个运动的性质。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中国的革命先驱者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五四”不但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肇始于“五四”前夕，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号召和影响下，开始寻求有效的革命道路和新的思想武器。它为“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上做了酝酿和准备，并通过“五四”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新军。“五四”以后各种宣传新思想的白话报刊和群众团体，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和社会制度。当时的先驱者由于运用了新的思想武器来观察现实，因而对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产生了新的希望和信心；这反过来也就成为寻求革命道理和批判封建文化的强大动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这一方面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它也是进行反封建战斗的有力武器，它与封建性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学革命是由提倡白话文开始的，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文学的形式和表达工具的革新，而是体现了如何能使文学更有效地为人民革命服务这一时代要求的。当时不仅主张白话文是一种完

美的文学语言，比文言文更富有艺术表现力，尤其强调的是白话文能够为一般人所看懂，容易普及，而这就实际上体现了文学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除提倡白话文以外，文学革命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对旧文学的封建性内容的批判；开始时主要是针对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五四”后就逐渐扩大到所谓国粹派和鸳鸯蝴蝶派。这种批判十分尖锐，充分体现了“五四”开始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陈独秀攻击旧文学说：“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①说明反对旧文学是与要求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的表现“人生”、“社会”的新文学密切联系的。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现代文学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而得到发展的。所以“新文学”一词中“新”字的最准确的解释，就在于文学与人民革命的紧密联系。鲁迅说他在《新青年》上的小说“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②总的看来，“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文学如何更好地为人民革命服务这一光荣使命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中国古典文学中尽管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历史上大的农民战争也在文学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就文学运动和创作的主流说，把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步伐而不断前进的。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是对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正是作家的鲜明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的爱憎态度的出发点，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的根本依据。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①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就现代文学的主流和总的倾向来说，是符合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不同，是作为人民革命的一条战线而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在作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一科学论断时，正是一方面指出了鲁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也就是代表全体革命人民，同时又指出了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鲁迅当然是最伟大和最杰出的代表，所以说“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但“鲁迅的方向”的意义并不仅指鲁迅一个人的方向，而是指从“五四”开始的“文化新军”的整个队伍的，文学就是其中最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这个队伍中的许多人的战绩虽然不能与鲁迅并论，但正如战士与主将的关系一样，从总的倾向说，都是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向着同一方向作出了贡献的。“五四”时期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好些人甚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也还是民主主义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③这个论断是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8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4页。

可以概括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者的情况的，说他们“倾向于革命”，就是说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革命对象有所憎；说他们“接近于劳动人民”，就是说他们有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愿望，对人民有所爱。这样，经过党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经过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总的来说，这些人都向着同一的方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人当然也有，但正如鲁迅所说，“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①大家都知道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不仅鲁迅如此，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许多人尽管经历不同，时间有别，在向着同一方向前进的道路中几乎都有着类似的历程。因为这是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所决定的。一个人如果确实有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就必然会在实践中向革命主流靠拢，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方向”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当然，历史情况十分复杂，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队伍也经历了不断分化和组合的过程，其中有倒向敌人阵营的，也有堕落和淘汰的；但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则即使是思想长期停留在民主主义的作家，也仍然在同一方向的指引下为革命和文学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保证了“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和通向社会主义的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②反帝反封建是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这里“彻底地”、“不

^① 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660页。

妥协地”两个形容词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对敌斗争的重大课题。中国封建社会中早已产生过许多含有反封建意义的作品，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则由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所决定，进步文学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但都谈不上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论，当时已经有人把西方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进步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些介绍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本身仍然与封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不敢把新事物和旧事物对立起来，并采取战斗的态度；反而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求联系和共同点，寻求调和与妥协的办法。反映在作品上，则虽然对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和封建官僚进行了谴责，对“洋人”的跋扈和外来的侵略表现了义愤，但最尖锐的也只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清朝统治者，而且还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并没有敢于要求推翻社会制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不同了，鲁迅作品从开始起就是要根本铲除人吃人的制度，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①郭沫若的诗歌唱出了彻底叛逆和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昂的革命情绪。巴金用他的小说对旧社会提出了“控诉”，曹禺热切地希望读者能对他所反映的社会悲剧能多提出几个“为什么”。^②作者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敢于采取战斗的态度，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充分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如同斯大林所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世界各被压迫国人民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殖民

① 鲁迅：《坟·灯下漫笔》。

② 参见曹禺《〈日出〉跋》。

地革命的时代。”^①这当然也就决定了现代文学向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尽管在开始时民主主义思想仍然占有主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②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在文学上的表现当然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观以及由作品内容所显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者创作的指导作用。但这在“五四”初期还只能属于幼芽状态，尽管从方向道路的意义上说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其次，社会主义因素也表现在文学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方面；因为这种彻底性不仅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和准备条件的，而且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的。尽管许多作者当时从思想范畴上说还是民主主义者，还属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如鲁迅所谓“遵命文学”所显示的社会意义那样，他们的文学实践客观上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许多人正是在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的。当然，一个民主主义者在他还没有经过思想立场的根本变化之前，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一切社会实践，自然也会给他的文学活动带来局限，但只要他对旧社会采取“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坚决态度，则不只这本身就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自己在实践中也是会逐渐改变他的思想认识的。“五四”以来无产阶级对文化战线的领导作用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经过团结和批评，推动了许多民主主义者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对革命的对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5页。

象采取不妥协的战斗态度，这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文学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就体现了“鲁迅的方向”的普遍性意义。因为这是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和鲁迅所说的“改良这人生”的要求所决定的。

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样是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把“大众的”与“民族的、科学的”一同规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正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中具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这也是现代文学与过去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对人民的态度是我们衡量一切文学遗产的标志之一，但封建社会的作者很少有直接反映人民思想情绪的作品，他们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晚清曾有过不少“启迪民智”的普及文化的活动，这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著名论文，就是由“群治”的角度来提倡新小说的；而白话谴责小说的盛行，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要求。话剧的形式是清末传入中国的，而春柳社的首先上演《黑奴吁天录》，正反映了同一的倾向。其它如新民体散文、新派诗等，皆在同一时代气氛中产生，而这些都是和“群治”、“新民”等政治要求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在它还领导革命的时代，它也是企图以全民代表的身份来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引导人民群众的态度既无力使革命取得胜利，也无法根本改变文学的面貌，就连那种很不彻底的文学改良运动也都不久就偃旗息鼓了。“五四”以后就不同了，民主是“五四”高举的旗帜，白话文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应为“文学之正宗”。二十年代初“民众文化”的提倡，“到民间去”的主张在作家中的

反应，都可以看出新的特点；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三十年代把“大众化”作为革命文艺运动和创作的中心，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创作活动和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都是沿着同一方向前进的。直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的根本原则，都显示了在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前进的步伐。在创作上这个新的特点就更明显，为什么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史竟然没有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而鲁迅则是把农民作为作品主要人物来描写的第一人？鲁迅不仅认为甚至象阿Q这样落后的农民也蕴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确信下一代的农民应该有“为我们所未曾生活过的”新的生活。其他的作者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在广阔的社会画面中，经受苦难的劳动人民出场了，作者们不仅揭露了上层人物的残暴和卑劣，而且也描绘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和不幸，以及知识分子的流离和挣扎等等，并且作者是鲜明地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的。由于大部分作者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虽然在生活体验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但就总的倾向来看，这些作品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情绪的。当然，“五四”新文学只是寻求正确解决文学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一个起点，但它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的现代文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五四”以来的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对于中国革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这就是“五四”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当然也是“鲁迅的方向”所包含的普遍的和历史的意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8页。

二 关于“五四”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当我们谈到“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指由“五四”开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关于“文学革命”的许多进步的主张和论点，归根到底必须在创作上得到体现，才能发挥它为人民革命服务的社会作用，因此鲁迅把他的《狂人日记》等最初发表的小说，看作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①。其实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切进步的创作成果都属于“新文学”的实绩，这些作品就其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来说，就是由鲁迅所奠定并向着社会主义文学方向发展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社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由于作者处于人民革命的时代，本身有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强烈愿望，他们渴望将自己所熟悉和理解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生活画面直接描绘出来，诉诸读者的共鸣，以推动社会的革新和进步，因此虽然许多作品今天看来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时代精神是鲜明的，所反映的生活基本上是真实的。鲁迅说他开始写小说是为了“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希望能“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而且由于他曾经“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③，他个人的经历又对知识分子十分熟悉，因此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成了他写小说的主要题材。“五四”时期的作家，尽管他们在叙述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发表的一些文艺主张中有各不相同的情况，尽管作品的成就高下不一，但由于属于同一的时代，而且阶级地位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和对改革的要求又几乎是相近的，因此在描写社会生活和对创作的态度上是有共同倾向的，鲁迅所开始的革命现实主义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当时的著名作家叶绍钧就说：“现在的创作家，人生观在水平线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说有一个一致的普遍的倾向，就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反抗，最多见的是写出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兵乱的灾难，而表示反抗的意思。”^①由于作家生活面的限制，“五四”时期的创作所反映的社会面还是比较狭窄的，描写工农群众的题材不多，作者的思想也不尽一致，但客观主义地描写生活的作品很少，反抗黑暗和渴望光明的精神很普遍，这正反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文学的要求和创作上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的结合。既然作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揭露黑暗，而为一种社会理想所引导，要求反抗和变革，因此也并不排斥有些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只是由于文学的体裁不同，作家的文学修养不同，在创作方法上有所侧重罢了。一个进步作家总是希望他的作品能给人以启示和教育，绝不愿轻易放弃体现自己社会思想和美学理想的可能，即使是批判、暴露的作品，因为表现了反抗和改革的要求，实际上也表现了作者的理想。诗歌由于感情强烈，主观抒情的成分同形象结合得紧密，就比较易于侧重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象郭沫若《女神》中的作品就抒发了作者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强烈诅咒和对未来新生活的热切追求，表现了高昂的时代的强音。这些感情是由社会现实迸发的，有牢固的生活基础，因此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上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抨击目标，接着又以鸳鸯蝴蝶

① 叶绍钧：《创作的要素》。

派为批判对象，从创作原则来说，就是批判一种反现实主义的不良倾向。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矛头就是指向鸳鸯蝴蝶派的，茅盾解释他们对这种共同的基本态度的理解是“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①鲁迅所坚决指斥的“瞒和骗的文艺”，就是指那些“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的封建文人，他们掩盖矛盾，粉饰生活，结果就只能产生出“大团圆”式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鲁迅用麻油和芝麻的关系来形象地比喻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他强烈呼吁：“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②鲁迅要求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必须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其实这就是由“五四”开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真正含义，它产生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时代，概括了许多进步作家的共同倾向，并且是向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前进的。

革命现实主义的产生除了时代的和社会的原因以外，当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外来影响。作为由作品体现出来的作者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方法，作为前人对文艺规律的探索和运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是有悠久的传统的。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本来就有深厚的民族传统，而“五四”时期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受过古典文学的传统教育，这是他们文艺修养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在创作实践中吸收古典作品的有用成分和艺术经验，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差别，这些经验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②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